

臺灣本土近代佛教的歷史變革透視：

日本殖民下的佛教歷史社會基礎（十七）

江燦騰

3. 臺灣佛教中學林的重要教育功能及其導致的教派大分裂

（1）臺灣佛教中學林的重要教育功能

但，「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的創辦，其最重要的功能，是臺灣本土佛教僧侶從此「似乎」有了較正規的現代養成教育之所在，亦即藉此中學教育的知識培養，往後的下一個階段，所謂高級水準的宗教師或宗教學者才有陸續出現的可能。

此因之前臺灣僧侶的社會地位甚低，學養嚴重不足，常遭來臺日僧和官員的鄙視。而其中能通日語

者，極為罕見，更不用說有進中學就讀的機會了¹。

故事實上，若未經歷中學階段的正規教育，縱使有機會到日本國內深造，也不可能越級進入正規的大學就讀，更不用說再入研究所攻讀高等學位了²。

為了進一步了解其在臺灣中學教育史上的地位，底下所列出的是迄大正11年（1922），「由於『臺灣教育令』改正各中等學校實施『共學』制度」，導致臨濟宗的「鎮南學林」被併入「私立曹洞宗臺灣中學林」為止，全臺相關中學設置名稱、年代及法令的列表資料：

中等學校名稱	創立年代	中等學校名稱	創立年代
1. 私立臺南基督長老教會中學	日治以前	9. 私立臺南商業學院（淨土宗）	1918年
2. 私立臺南基督長老教女學校	日治以前	10. 公立臺北女子高等普通學校	1919年
3. 私立淡水中學（長老教會）	1914年	11. 公立彰化女子高等普通學校	1919年
4. 公立臺中中學校	1915年	12. 公立臺北第二中學校	1922年
5. 私立鎮南學校（臨濟宗）	1916年	13. 公立臺南第二中學校	1922年

6. 私立靜修女學校（天主教）	1917年	14. 私立淡水女子學院（長老教會）	1922年
7. 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曹洞宗）	1917年	15. 私立曹洞宗臺灣中學林（改制）	1922年
8. 私立臺灣工商學校（東洋協會）	1917年	16. 私立苗栗中學園（真宗苗栗佈教所）	1923年

說明：1. 佛教界專為臺灣人子弟而辦的中學，最早是大正2年（1913）3月提出的「私立臺灣真宗中學校」，但未辦成。2. 臨濟宗辦的「私立鎮南學校」初辦於大正5年（1916），但非中學，大正6年才改中學課程；一直到大正7年才獲「公稱」，可至大正11年，即被裁撤、併入「私立曹洞宗臺灣中學林」。3. 因「臺灣教育令」是大正8年（1919）頒佈，故從此年開始，臺灣民眾子弟才能進公立的各工、商、農中學校。特別是公立女子中學對臺灣女子教育開闢了新途徑。並且，一般「公學校」的6年制義務教育，也確立下來。4. 「臺灣教育令」頒佈後，新增臺灣學生須定期朝禮臺灣神社的條款。5. 大正11年（1922），「臺灣教育令」修訂，各中學開始施行共學制度。但培養有關僧侶的教育，亦被禁止在正式體制內的學校中實施。

【資料來源：《真宗本派本願寺臺灣開教史》：302-303。】

從以上的資料來看，「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的創辦，除西洋教會學校所辦的中學之外，僅次於

否則就必須在體制外的道場培訓或到大學去就讀佛學科了。

臺人首創的「臺中中學校」，但早於「臺灣教育令」頒佈之前2年。換言之，幸好是處於過渡的階段，才能允許此種培養佛教人才的私立中學存在，

其次，底下再增列一日治時期畢業於「私立駒澤大學」的臺灣學生名單、科別及畢業年度：

姓名	就讀科系	畢業年代	姓名	就讀科系	畢業年代
1. 曾景來	佛教科	1928年	14. 蔡添火	佛專科	1940年
2. 李添春	佛教科	1929年	15. 宋春芳	佛專科	1940年
3. 高執德	佛教科	1930年	16. 張玄達	佛專科	1940年
4. 林秋梧	國漢專科	1930年	17. 張繡月（女）	佛專科	1940年
5. 許繼麟	佛專科	1930年	18. 呂竹木	佛專科	1940年

姓名	就讀科系	畢業年代	姓名	就讀科系	畢業年代
6. 莊名桂	東洋科	1931年	19. 楊聲喈	地理科	1940年
7. 吳瑞諸	東洋學科	1933年	20. 王傳烈	佛專科	1942年
8. 李孝本	人文學科	1933年	21. 林陳喜	佛專科	1942年
9. 黃英貴	佛教學科	1933年	22. 吳志誠	佛專科	1943年
10. 黃連指	地理學科	1934年	23. 陳吉村	佛專科	1943年
11. 李樹林	國漢科	1939年	24. 郭靜光(女)	佛專科	1943年
12. 王進瑞	佛專科	1939年	25. 吳振聲(肄)	佛專科	1943年
13. 楊水中	人文學科	1939年	26. 林金蓮(女·肄)	佛專科	1943年

資料來源：《駒澤大學臺灣同學會名簿》，臺北：法光寺，1973。

以上的資料顯示：

一、臺灣佛教高等教育，後階段必須仰賴日本國內的佛教大學來完成。

二、有大學程度的臺灣佛教學者，必須到日本統治臺灣的第33年（1895～1928）才出現。換言之，是日本殖民統治臺灣50年的後半部才出現，所以佛教的中學教育，在日治前期佔有相對重要的地位。

因此，「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第一屆畢業生林德林，即在此一從中學到大學過渡的階段中，迅速崛起和達到生平佛教事業的最高峰（詳後）。

三、由於日治時期臺灣佛教女性有大學畢業

生，要遲到1940年才出現，但此時早已進入「皇民化運動」時期，整個臺灣佛教都已處在全面配合軍事的動員中，故不能有其自由揮灑的空間。亦即日治前期的臺灣本土佛教發展，事實上只能仰賴大學以下的佛教女性來奮鬥。

然而，又因「臺灣教育令」是大正8年才頒佈的，故有中學畢業的佛教女性，也是要到昭和初期以後的事了。但，這也同時解釋了何以在昭和初期，臺灣北部會出現有不少現代佛教女性紛紛自創新道場的教育背景。

（2）臺灣佛教中學林所導致的教派大分裂不過，在另一方面，也由於「私立臺灣佛教中

學林」的創辦，使日本曹洞宗在臺灣佛教獨霸的局面，遭受另一次嚴重的分裂與頓挫，並使同屬禪佛教的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得以從中取利，迅速擴張至與日本曹洞宗在臺可以分庭抗禮的程度。

而其變革原因和後續的發展如下：

一、根據王見川的精心研究，在南臺灣極富盛名的清代古剎「大仙岩」（現名大仙寺），到大正初期——即「西來庵事件」爆發之前，是由當地的武術家兼龍華派的「太空級齋友」廖炭負責修建的。廖炭經過4年的奔走，籌得3萬圓的巨款，到大正4年（1915）秋天，即在「西來庵事件」尾聲，有基隆月眉山靈泉寺的沈德融（時已任一教師補）及同門師弟林德林等數僧來遊，於是就在當年陰曆9月（桐月）將戶口申請寄留在「大仙岩」，並兼任住持之職，林德林副之。使得「大仙岩」因而「諸事煥然，遐邇參詣絡繹」。

但大正5年（1916）4月初，因在臺北舉辦領臺20週年的「臺灣勸業共進會」，並爆發了與基督教長老教會眾牧師互批的「大演講會」，於是德融、德林、德文、德圓等，便離寺聯車北上，參與了此次的「大演講會」，以及加入了新成立的「臺灣佛教青年會」。

到了同年6月15日，由於「私立臺灣佛教中學」開辦有望，德融、德林等決志轉往臺北來發展，於是正式辭退了寺職和遷出寄留的戶口。當然，改建工程規模才粗具，即遭大颱風襲毀，亦是彼等離寺北上的一大因素。但，從此「大仙岩」便與曹洞宗無關了³。

二、可是，由於「臺灣佛教中學林」在隔年正式創辦後，江善慧、沈德融師徒同任職其中，徒弟林德林、徒孫李添春（普現）、曾景來（普信）則入林就讀，等於囊括大多數的職位和好處，於是屬於臺南開元寺另一系統的新住持陳傳芳，與臺北五股庄觀音山凌雲禪寺住持沈本圓，便拉「大仙岩」的負責人廖炭一起，接受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鎮南山臨濟護國寺」新住持長谷慈圓（1914.6～1918.12.4在職）的勸說，脫離原日本曹洞宗的聯絡系統，改加入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的聯絡系統。

長谷慈圓安排彼等與丸井圭治郎先至大陸朝禮閩、浙佛教名剎，再東渡日本朝禮該派大本山——位於京都市右京區花園妙心寺町的妙心寺，其受到的禮遇，比日本曹洞宗大本山對待江善慧之前訪日時的等級，尤有過之。

亦即先安排彼等：謁見岡田文部大臣、柴田宗

教局長，參觀貴族眾議兩院等之外，該派貫首「元魯大國師」又召見彼等開示禪法，並贈與臺南開元寺計有：1.「訓點大藏經」全套一部；2.大正天皇的「御金牌」一基；3.「臨濟祖師舍利塔」一座；4.「被下附7條金襴袈裟」二領；5.及「安陀衣」5肩⁴。至於廖炭的「大仙岩」則受贈（a）「千年古佛」一尊；（b）大正天皇的「御金牌」一基⁵。儘管如此，根據臺南開元寺書記鄭卓雲的事後回憶，仍提到：

……開元自前清之禪德及寺中之行事，皆與湧泉有密切之關係。迨臺灣改隸之後，大正6年丁巳6月4日，傳芳和尚為圓日臺佛教聯絡，闡揚大法，乃與京都臨濟宗大本山妙心寺派聯絡，受統於轄下。由是本寺僧伽多掛籍於大本山妙心寺者。然因內臺人風俗習慣懸殊甚遠，故本寺制度不能與妙心寺同例，惟佈教機關之聯絡，而寺制則仍依舊例自為獨立者也。⁶

可見臺日佛教之間的巨大差異性，並非表面上的榮耀和贈與一些禮品，就能解決的。並且，在另一方面，促成臺南開元寺、臺北觀音山凌雲禪寺、

臺南白河大仙岩等臺人寺廟轉投日本臨濟宗妙心寺派的兩要角：長谷慈圓和陳傳芳，都在締結「聯絡」之約後，即先後過世（長谷慈圓在1918年12月4日、陳傳芳則在1919年5月1日）⁷，因而使得雙方正在展開的事業夥伴關係，也跟著萌生了不少新的阻力。

其最大原因是，新負責前往臺南開元寺「聯絡」的臨濟宗妙心寺派日僧東海宜誠，雖極力推動以臺南開元寺為中心的南臺灣教勢擴張計畫，但未能獲寺僧的一致支持，寺中開始出現支持和反對東海宜誠過度介入寺內事務者，以致連開元寺本身也從此陷入長期內部的派系紛爭與處於半分裂狀態。因而日僧東海宜誠，正是導致此一紛爭與分裂的主要禍根之一。（未完待續）

註釋

1. 以江善慧的門徒沈德融為例，江善慧與日本曹洞宗的交涉，幾全靠懂日語的沈德融在奔走所促成的，李添春的日語也是由沈德融親自教會的，否則根本無法讀中學課程。而沈德融赴日進中學就讀後，尚未畢業，就因江善慧缺日語助手而強迫其綴學返臺幫忙。

2. 例如在「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的第一屆畢業生中，即有李添春、曾景來二人，彼等日後不但繼續赴日就讀原曹洞宗大學林改制為「駒澤大學」後的佛教學科；畢業返臺後，又先後但任「南瀛佛教會」的機關刊物，也是影響日治時期臺灣本土佛教思想變革最大的佛教雜誌《南瀛佛教》主編。其中李添春個人甚至因此能協助增田福太郎從事第二次全臺的宗教調查，以及進一步受聘到新設立的「臺北帝國大學」服務，戰後更成為改制後的「臺灣大學」農經系教授，直到退休。可見此一「私立臺灣佛教中學林」對臺灣佛教影響之重大了。但臺灣第一位獲正式博士學位的佛教學者是葉阿月，並且她是戰後才在東京大學獲得，且非出身「私立曹洞宗臺灣中學林」或「私立臺北高級中學」。因此，日治時期臺灣佛教學者的學歷，僅止於大學畢業。

3. 參考王見川，〈略論日據時期的東海宜誠及其在臺之佛教事業〉，收入氏與李世偉共著《臺灣的宗教與文化》：69-85，臺北：博揚文化，1999。及氏撰，〈日治時期的「齋教」聯合組織——臺灣齋教龍華會〉，《臺灣的齋教與鸞堂》（臺北：南天書局，1996），頁143-168。

4. 黃慎淨編，《開元寺徵詩錄》（臺南：臺南開元寺客堂，1919）提到：「……側逢安東總督閣下。及下村民政長官。皆熱心於宗教。殫真力以贊成。所以北園僧侶傳芳、成圓、本圓諸師。欲圖日臺佛教聯絡。闡揚臨濟宗風化。導臺島人民。共仰帝國皇恩。特與臺北臨濟寺主。長谷慈圓師。丸井文學士。杭華西。游踏花東渡。不辭洋海。遍歷中華。逕訪名山。視察宗教。飛錫於普陀洛伽。渡杯於西湖靈隱。繼而觀光帝國。參詣京都。叩謁祖師蓮塔。參拜桃山御陵。幸

遇謁見岡田文部大臣。及柴田宗教局長。拜覽天皇陛下御園。參觀貴眾議兩院。更蒙妙心寺派。元魯大國師貌下。開示禪宗法要。賜大藏經文全部。今上（按：即大正天皇）天皇陛下御金牌一基。臨濟祖師舍利塔一座。被下附7條金襴袈裟二領。及安陀衣5肩。……」，頁3。

5. 《臺灣日日新報·漢文版》大正6年（1917）10月3日報導。

6. 鄭卓雲手稿本，《臺南開元寺誌略稿·法派》，1930。

7. 陳傳芳的過世日期，盧嘉興誤記為大正7年；李筱峰在《臺灣革命僧林秋梧》一書，則據《國師同學會五十週年紀念誌》：119、1972.3。認為是大正9年（1920）。但，王見川據《臺灣日日新報》（1919.5.7）的報導，確定是屬於大正8年5月1日；而同報也登鄭成圓於同年8月7日晉山任住持。見王見川，〈略論日據時期的臺南開元寺（1896-1924）〉，《圓光佛學學報》第4期（1999.12），頁289。